

可以预期的是,随着两地关系的进一步紧密,随着更多的广东商人走进湖北,他们身上浓烈的地域色彩将逐渐消散。

广货北上 粤商转战湖北

□ 刘婧婷 章骏

受岭南实利重商文化影响的广东商人,一向习惯单打独干,但在有共同利益诉求时也开始抱团合作。早在明清时代,他们就位列十大商帮之中。在现代社会,粤商几乎成了财富的代名词,他们具有天生的商人意识。

据长江商报报道,当广东的抽油烟机、洗衣机、冰箱、录音机、电视机、饮料、电子表、遮阳伞、弹簧秤、尼龙袜、柔姿纱、T恤衫等风靡中华大地的时候,当广东人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昂首挺胸地游走于大街小巷时,电视剧中戴着墨镜、说话广东腔的广东老板们已经悄悄影响了湖北人的生活。

“粤二代”说一口武汉话

“广东人一向爱喝‘头啖汤’,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开辟市场的往往都是广东人。”47岁的广东增城人叶金源来汉已有25年,现任武汉溢龙汽车用品市场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,也是湖北第一个卖汽车用品的人。“他们这一代比起我们当然有许多优势,受的教育多,在营销方面有很多新想法。”

虎父无犬子。叶金源25岁的儿子叶任桦已是总投资超过1500万元的广东汽车用品商贸城的董事长。

叶任桦干起汽车用品来得心应手,他说:“从小父母就是做这个生意

的,耳濡目染也学到很多。当然最开始进这个行业时,我就是每天跟着业务员跑业务,了解市场。”

叶金源这样评价儿子:“他们这一代比起我们当然有许多优势,受的教育多,在营销方面有很多新想法。而且这么多年,他从小就在这样的生意氛围中,起点比较高。”

对叶金源来说,退休后他还是想回广东。“虽然扎根武汉这么多年,但是家毕竟还是在广州,亲戚朋友也在那边。所以退休后,我应该还是会回广东。”

而说得一口流利武汉话的叶任桦和父亲相比,则更像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,“我的朋友家人都在武汉,也非常习惯这边的生活,以后会和父母回广东探亲,但是还是以在汉的时间居多。”

粤商捕捉高铁商机

“什么情况下,我们就做什么事。以前我们在湖北卖广东货,现在我们把湖北货卖到广东去。”

新一佳超市湖北总部,卓刀泉店五楼。在记者采访期间,钟如画的办公室一直人流不息。

“做零售业,就是非常辛苦和琐碎。”今年3月到任的湖北新一佳的总经理钟如画,来自深圳,客人。

“2006年我就来过湖北,那时候加入了湖北广东商会,后来又先后去了湖南和成都,没想到兜兜转转一圈

之后又来到了湖北。”钟如画介绍。

但是今年,新一佳开始把湖北作为食品基地向周边地区辐射。钟如画说:“现在每个星期我们超市发出去的湖北鸡蛋就有十个车皮,其他农产品,木耳、莲藕等也特别多。”

对她说,广东商人最大的特点是适应能力很强。“什么情况下,我们就做什么事。以前我们在湖北卖广东货,现在我们把湖北货卖到广东去。”

一直以来,粤商尽管行事低调,仍然被认为是最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商人群体之一,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开放兼容、精明务实以及善于抢占先机。

“抢先一步,才能赚到钱。”对很多广东商人来说都是这样。曾景荣也是这样,在高铁开通后,借高铁经济的势头到武汉发展。

记者致电曾景荣时,正值周末,但他仍然在忙碌。作为广东佛奥集团旗下武汉盈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,他一个月有1/3的时间在武汉,其他时间多在广东佛山。

“去年12月,光谷的一块土地我们中标了,所以才过来发展,也是集团第一次来汉投资。”曾景荣介绍,1992年他第一次来武汉,真正对武汉有所了解是在这次担任执行董事以后,高铁开通后,曾景荣发现不少广东的朋友都有来武汉看一看的意向,更多的人是想在武汉发现商机。

“我关注到对于高铁的开通,广东人要更敏感一些。借这个机会过来的人很多。”曾景荣表示,广东正在进行产



业转移,很多产业即将转移到中部来,“我认为这是一个来湖北的好契机。”

广东是“新店” 湖北成“新厂”

改革开放后粤商的发展是分不开的。改革开放后,粤商涉足各个领域,“家家办工厂,人人当老板”,“广东制造”充斥了大江南北的市场,“工厂主”也成为粤商的代名词。

正如目前广东省政府为支持“广货北上”,正在武汉推动建造占地上千亩的广东商贸城。商贸城设立广州、深圳、东莞、江门等各地分馆,成为集中展示、销售广东各类商品的超级大市场。据湖北广东商会领导介绍,广东省将由政府部门出面在当地招商,并给予专门扶持政策,以抢占湖北及中部的内需市场。

据资料显示,目前广东在汉投资项目已达2500多个,投资额达1500多亿元,有600多家广东企业设有驻汉机构。

不久前,东莞八大支柱产业之一的家具业整体入驻汉口北,建立东莞产品内销商贸物流基地。这个总投资52亿元的项目,意在抢占中部地区年

“很多互联网小企业不知道怎么和政府交流,而是故意逃避和政府交流……视野和意识,决定了小企业的生存。”

互联网商人的“沟通”短板

□ 苏商

2008年10月后的一天,正值每年的新优惠政策出台,一辆黑色本田吉普车停在南京市科技局大门对面的窄道上,车内主驾驶座位上,一个眼神单纯,头有些拧巴呈僵直状的大龄青年,直瞪瞪地看着科技局的大门。

他的内心左右摇摆不定,挣扎着做最后一次决定。口袋里叠的像个小木块的项目资金申报表,犹如他此刻内心的真实写照,折有千层。

“我到底是进去还是不进去?进去了怎么说?和他们见面还是划清界限?”南京一个知名网站CEO宋吉洋(化名)不止一遍地问自己。

据江苏商报报道,这个被南京互联网圈内冠以“技术光环”的站长宋吉洋,秉持着2005年以前国内已驾轻就熟的个人维护网站技术能力,成功获得网站流量的个人草根站长的所有性格禀赋,对逻辑和数字分析能力极其高超,自学SEO(搜索引擎排名优化)成才,对技术的追求近乎苛刻。

也是由于天天对着程序,与外界信息交流不对称,不善人际交往,因害怕政策对网站监管,恐惧或从不接触政府是他们的本能心态。同时,他们亦有着纯粹甚至纯真的性格,所以被冠以“技术站长光环”。

然而,光环的背后,宋吉洋的性格短板在一次次与社会接触的碰撞中显现。全国前150名网站中,只有两家网站进入排名,一个是西祠,另一个就是宋的网站,宋是最早一批凭借个人技术做便民信息网站,靠流量赚取广告费的个人网站站长,他有7个员工,每月10万以上的广告费收入,小日子足够过。从流量和影响力来说,圈内拿到创业种子基金,深知流程的朋友认为他有较大可能拿到创业基金。

最终,意识很难改变性格,宋还是没有走进科技局的门。

另外一个使得互联网企业不愿与政府交流的重要原因,是南京的很多互联网小企业出于成本的考虑,省去对员工进行企业公司性质的五险一金的工资福利,发放工资或提成也不纳税。因此,很多互联网小企业不是不知道怎么和政府交流,而是故意逃避和政府交流,这或许不是南京互联网小企业的通病,而是在企业发展阶段之前的企业通病。视野和意识,决定了小企业的生存。”江苏电子商务集团副总裁於志仁说。

於志仁称,马云一开始就有企业规范化意识,所以他可以很快地展现在政府、媒体的面前,获得他们的帮助。

事实上,南京对高新科技、软件企业、信息服务业(互联网企业)的扶持力度比较大。据南京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,每年10月,南京科技局会发布今年被拨款经费及扶持产业和项目的申请条件。而发布项目资金申请的通道通常有两个:科技局网站和全市的各个科技园区。

“南京的相关扶持政策和企业的对接没有杭州、上海、北京等市的对接效果好。比如其中每年的优惠政策中有一项10万元的创业种子基金,比较适合创业一年以下的互联网创业型企业,但是企业平时没有意识关注政策,不和政府交流,和优惠政策基本无缘。”於志仁说。

探讨武安商帮这一独特经济文化现象,挖掘、整理、研究武安商帮产生发展历程及深远影响,确定武安商帮在中国商业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
武安商帮9月舞“文”

□ 高树其 白增安

为传承和光大武安商帮人文精神,河北省武安市将于9月24日至26日举办武安商帮文化论坛。

武安商帮是活跃在中国晚明、清

代及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商业群体,其人数之多、涉及地域之广、社会经济影响之深可与历史上的晋商和徽商比肩。武安商帮在300年的历史里所积淀和蕴育的丰厚的文化内涵和商业人文精神,是武安人宝贵的精神

财富。

据悉,论坛举办期间,武安市将邀请全国各地知名学者、武安商帮后代、知名医药企业共同探讨武安商帮这一独特经济文化现象,挖掘、整理、研究武安商帮产生发展历程及深远

影响,确定武安商帮在中国商业史上的重要地位。同时,借助媒体的力量,向国内外宣传展示武安渊源深厚的专业人文底蕴,为该市扩大开放和引进先进生产要素打造优良的人文环境。



□ 王晓波

富豪移民,究竟是在“企业家原罪”语境下的“出逃”行为,还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才、资本的自由流动现象?他们内心在寻求什么?富豪移民究竟尴尬了谁?

当比尔·盖茨和巴菲特向全世界的富豪倡议捐献财富的时候,中国一些富豪们却在酝酿着如何移民。

企业家是“大客户”

如果说精英们或通过留学移民,或申请技术移民,那么在苏州,还有越来越多的经商成功人士,在通过移民中介申请投资移民。短短几年间,苏州具备资质的移民公司从3家发

展到10多家,并且还在不断增加。而他们的客户大多都是企业家。

来自上海侨报的报道称,在苏州工业园区,赵强经营着一家移民中介公司,他在苏州乐园附近还有一个分店。他告诉记者,从1996年从事这一行至今,经手办理的移民客已在1000人以上。

“每年都要接待不少办理投资移民的富豪,在接触的客户中,大多数‘有钱人’,一般长期居住在国内打点生意,偶尔出国居住一段时间。这些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在苏州打拼起来的,而且一般到发家时已经人到中年了,他们既不会英语,也不可能适应国外的生活环境。”赵强说。这些客户无一例外都会问,哪个国家最好办?哪个国家没有语言要求,也不用去坐“移

一边是对中国富人“一富就跑”的追问,另一边不少人开始担心社会精英和财富的双重流失。

尴尬富豪移民潮

民监”?

赵强坦言,对他们来说,钱不是问题,他们最希望的是把费用交给移民中介以后,越省心越好。比如一度以地域辽阔、风景优美颇受国人关注的新西兰,因为对投资移民有较高的英语能力要求,因此并不受富豪们的欢迎。“你让这些企业家去考雅思,怎么可能呢?”而办理时间短、税改政策的新加坡就很受他们关注。

现在很多国家都意识到中国富豪的实力,非常愿意吸引国内的商业精英前去投资。加拿大最近刚刚调高了投资移民的门槛,移民投资金额由40万加元增至80万加元,申请人家庭总资产要求也从80万加元倍增至160万加元。

然而有投资移民念头的苏州富豪对此毫不在意,因为对这些人来说,80万加元和160万加元的差别并不大。

“黑土”流失的尴尬

近日,看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对东北黑土流失的担心,突然想到,近年中国大量富豪和精英的移民,不也是一种“黑土”的流失吗?

一边是对中国富人“一富就跑”的追问,另一边不少人开始担心社会精英和财富的双重流失。深究移民背后的根源,有人将其归结为制度、法律以及人人敬畏的公权力。

由于掌握着国内大量资源和财富,富豪移民所引发的财富和人才流失之忧,更将富豪推向了舆论的漩涡之中,甚至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。

因为富裕,让富人有游离于制度

之外的可能;有移民国外做后路,富人就有可能会攫利而无所不用其极,因为自己伤害的只是“别人的国家”;而移民国外之后,富人非但无损在国内攫利反而还有外宾优惠,又何乐而不为?不难发现,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从众暗示作用的恶性循环。

在担心的同时,我们也不得不思考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:这些富裕阶层,在国内生活无忧,却为什么选择集体“逃离”他国?富豪移民现象涌动的背后的的社会背景是什么?

在富豪移民的所有理由中,与马云、刘建一样,大多数富豪都将子女教育问题作为移民的第一原因。

更有分析认为,中国富豪的公众形象向来不佳,“无商不奸”、“为富不仁”更一度成为富豪的代名词。黄光裕案件再一次将“企业家原罪”提升到了一个高度。公众相信,中国的富人都是有“原罪”的,都是偷税漏税的。富豪们对自己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担忧也是促使他们纷纷选择“外逃”的原因之一。

随之而来的是,社会公众随时可以挥向富豪们的道德舆论大棒,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,时刻悬在中国富豪们的头上。在多数受访者中,担心被“均富”和缺乏社会安全感,是他们内心绷紧的一根弦。

在富豪们担心不安全、仇富心理和教育制度的时候,也反映了国内社会的种种不和谐,以及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生活安全感的缺失。

尴尬的不只是富豪,更令人尴尬的是,中国富豪们可以荣登福布斯富豪榜,却在故乡找不到适合自己扎根的土壤。

